
二戰期間的基隆中學校少年兵 ——廣繁喜代彥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黃毓婷*

記錄：黃毓婷

時間：2018年7月15-20日、2018年9月6日、2019年
1月26-28日

地點：銀座コージーコーナー（東京都中央区銀座1丁
目8-1）、臺北國賓飯店

廣繁喜代彥(1929-)生於基隆八堵，1936年就讀基隆市双葉尋常小學校，1942年就讀基隆中學校。父親是日裔美國人二世，1929年來到臺灣，在鐵道部服務；母親與祖母在八堵車站內經營食堂。中學三年級時因「警備召集」與同年級學生共同編入「特設警備第519中隊・灣13866部隊」，駐地在基隆中學。1946年因日本戰敗遣返，回到祖父故鄉的山口縣，1948年擔任專賣局職員，1955年在東京大手町、有樂町經營咖啡廳「ひろ」，組織基隆中學校在日校友會「堵陵會」、双葉小學校校友會，以及基隆灣生的同鄉組織「基隆會」，長期協助會務的營運及會報刊行。2018年電影《心の故郷～ある灣生の歩んで来

*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た道》(林雅行導演, CREATIVE21 製作, 2018 年 5 月 19 日起於渋谷・EUROSPACE 首映。中譯《心的故鄉～灣生的山與海記的記憶》2019 年 2 月 27 日於臺北喜樂時代影城、高雄奧斯卡影城上映)曾對他有簡短的訪談。

雙親來臺的緣由

我是廣繁喜代彥, 1929 年出生在臺灣, 我是八堵囡仔。父親是鐵道員, 從我出生到遣返回日本前, 一直住在基隆的八堵車站附近。我出生的地址是「八堵南 95」, 是隔著馬路面向八堵車站的一棟樓房, 後來搬到「八堵南 25」, 是車站內的宿舍, 母親和祖母在這裡經營一處供站內員工使用的食堂。

我的父親廣繁丈治(英文名 George Hiroshige)是在夏威夷出生的日裔美國人第二代。祖父廣繁彥三郎遠走他鄉到美國去的原因, 是因為依日本傳統社會的習慣只有長男能繼承家業, 祖父既然不是家中長子, 只能出外自謀生路。¹ 父親出生在夏威夷, 15 歲時從夏威夷來到了山口縣的柳井, 先進入當地小學讀了五、六

1 明治元年(1868 年), 日本政府應派駐橫濱的夏威夷王國領事之託, 徵募 153 名「契約移民」前往夏威夷從事甘蔗園勞務, 成為近代日本移民海外的首例。爾後隨著兩國間渡航條約(1884 年)、勞動移民條約(1884 年)以及移民保護法(1895 年)的簽訂, 移民夏威夷的日本人絡繹於途。1900 年, 美國將夏威夷併為領地兩年後, 即禁止夏威夷當地的契約移民, 對非契約的自由移民則不加限制。井上雅二《海外移住問題の實際》(東京: 日本植民通信社, 1931 年) 76-79 頁。廣繁彥三郎是在夏威夷禁止契約移民以前, 便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去到了夏威夷。

年級，然後進了中學。中學畢業後，曾經在柳井當地的日本通運公司工作，在這裡經人介紹認識了同是山口縣的女子吉田シカ，後來便一起到了臺灣。

我的母親吉田シカ（音：shika）是山口縣人，畢業後到臺北旅行，因為房東的介紹而在臺灣住下、工作。後來又經人介紹認識了同鄉的日裔美國人廣繁丈治，回到山口縣共組家庭。四、五年後，大約 1929 年時，因覺山口縣的生活不比臺灣，夫妻帶著兩名幼子移居到臺北。

父親與母親來到臺灣時，母親的三位姊姊都已經住在臺灣——大姊在新竹、二姊在臺中、三姊住在臺北。母親的三姊夫在交通局鐵道部的臺北本部服務，父親透過他的引薦，來臺之初在鐵道部的本部工作了一段時間，1931 年開始在八堵車站工作。

我的祖母也是日裔美國人，大約是 1934 年從夏威夷來到臺灣，與她的長子、我的父親同住。小時候不懂英文，只覺得祖母常常說一些奇怪的語彙。比如說小時候，八堵車站前的縱貫道上，除了總督府鐵道部的局營公車和卡車偶而會經過之外，幾乎看不到汽車通行。儘管如此，祖母總是禁止我們在車道上玩，說：「ROAD 危險，別靠近！」。我當時調皮，總是反駁祖母：「不是ロード（ROAD 的日文音譯），ドーロ（日文「道路」語音）才對」。

1945 年 9 月以後，街上出出入入的美軍變多了。有一回我和祖母搭火車，身邊就坐著兩名西方人。讀基隆中學時雖然學過英文，但真正聽到了外國人的交談時，我是一句也聽不懂，反而是祖母仔仔細細地把他們的對話說給我聽，才知道他們是來自 STATES 的美國軍人。

當年父親決定離開美國到日本去唸書時，據說祖父相當反對。父親那時若是順從祖父待在美國的話，我就成了戰勝國的第三代日裔美國人，但父親沒有。父親與母親到了臺灣，十五年後，我和母親、祖母及弟妹們作了戰敗國的子民，從基隆港搭船去到了陌生的日本。對我來說，臺灣才是我的故鄉，身體還健康時，我幾乎年年回臺灣。我的孩子總笑我說，爸爸，回日本才是回家，到臺灣去怎麼說是「回家」呢？

八堵車站

我因為父親就是鐵道員，母親也在車站內經營食堂，與本線和宜蘭線上的車站員工都是熟識，從小我就喜歡搭火車沿路玩，尤其喜歡宜蘭線上臺灣東北角的小車站。

基隆每年都辦棒球賽，在基隆的公家機關和企業都會組團參加，印象中基隆的稅關、肥料會社、基隆車站、八堵車站都有棒球隊，而且八堵車站的棒球隊很強。我還記得小學四、五年級時去觀賽，八堵車站球隊的投手是益子²，打擊手是松浦。

八堵車站的站長池上三藏在 1930 年左右³屆齡退休時，曾經

2 在《總督府職員錄》中同姓氏且與鐵道部有關聯的唯「益子勇」一人。據《總督府職員錄》的記載，益子勇自 1929 起至 1944 年間，大多時間任職於鐵道部改良課、工務課。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資料庫「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3 依據《總督府職員錄》的記載，池上三藏任職八堵站長的期間為 1928～1931 年間。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資料庫「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和八堵車站的站員拍過一張合照，我的父親也在其中。我算過這張合照上的人，大約 63 人，如果加上因公務無法入鏡的人，算來八堵車站的站員應該有 70 人以上，日本人占半數。車站的工作大概分為「機關」「乘務」和「保線」，還有許多的「驛夫」。「驛夫」不算正式員工，因此車站裡實際的工作人數絕對比《總督府職員錄》記載的人更多。⁴

1936 年，我進入基隆市雙葉尋常小學校（今·仁愛國小），我的兩位兄長則是同一所學校的四年級和六年級學生。入學第二年，中日戰爭爆發。我還記得戰爭爆發後不久，學校的三橋校長在全校學生的朝會上告誡我們：在基隆港邊玩的時候，如果遇到不認識的人探聽港灣水深多少？哪艘船叫什麼名字的話，可能是敵人的間諜，千萬要當心。

1942 年左右，八堵、七堵的小孩不能再到雙葉小學校去讀書了，學生要去汐止。可是汐止太遠，八堵的孩子大多就選擇搭公車到日新小學校就學（今·中正國小），我的弟妹們就是如此。到了 1945 年 5 月左右，基隆因為時常遭受空襲，日新、雙葉、仙洞等小學校的學生，若非跟著家人疎開到鄉下地方，就由老師帶著疎開到北投。仙洞因為有基隆築港局的宿舍和眷屬，他們會蓋房子、有資源，就在汐止蓋了長屋，把多數家眷都疎開到

4 據廣繁喜代彥口述，昔日八堵車站的日籍站員返日後，由住在九州大分市的菅本鐵太郎（1937 年起於八堵車站服務，應工作至戰後）於 1965 年前後發起「八堵會」，會員皆為戰前服務於八堵車站、且其職務多屬「機關」「乘務」的站員。「八堵會」在九州別府市舉辦過三次聚會，旋即告終。池上三藏的退職紀念照是廣繁喜代彥在「八堵會」的聚會中，從會員所保存的舊照中所見。

汐止，小孩也轉到汐止的小學就讀。留在基隆的小學生則在七堵公學校借了一間教室上課，稱為分校，由野崎東和另外兩位女老師上課，學生仍從家裡上下學。二戰結束後，日本戰敗，我的弟妹們從家裡走到七堵公學校的路上會被丟石頭，野崎老師擔心學生受傷，曾經停課一段時間，想在八堵找個合適的地方上課，最後找到了我家。因此戰後我的家成了「八堵分教場」。

基隆空襲

1944年10月12日，美軍的飛機來到基隆空襲。我住在八堵，並未親身經歷，但因為住在基隆的同學們議論紛紛，也就知道了這件事。⁵ 住在基隆港邊的同學說，看到一群美軍的飛機出現在上空，其中有兩架也許是被山上的高射炮或者軍艦上的機槍打中了，一架墜落在第十四號岸壁附近的山崖，另一架的飛行員在墜機前打開了降落傘，並且在落下時拿手槍對著地上的人們射擊。開槍的飛行員最後落在臺灣人聚居的大基隆⁶，臺灣人拿棍棒

-
- 5 據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前衛出版，2015年8月，27-28頁），美軍無畏號上的第18艦載機大隊在1944年10月12日上午轟炸基隆港。另參「美國空軍歷史研究部（AFHRA）徵集成果」Call編號：142.65291-3/Feb 1944/IRIS編號：00116676/微卷編號：0000002726，可知基隆港灣周邊尤其西岸碼頭和油槽為美軍的空襲標的。
- 6 依《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東京：東京交通社、1929年）地圖背後的文字說明，「大基隆」「小基隆」分指港灣的西岸與東岸；港灣西岸的大基隆涵蓋牛稠港、仙洞，小基隆則包括三沙灣、大沙灣等地。然而，筆者所訪問的幾位基隆灣生在提到「大基隆」時，指涉的範圍通常僅限於奠濟宮到慶安宮一帶清朝以來即發展成的臺灣人傳統街區。

圍毆他，直到他被憲兵帶走。

空襲後留下的子彈被學生們揀回家，把子彈後端的鉛熔化之後用鐵絲繫在腰帶上當作飾品，在基中風行一時。另外，有些同學到仙洞的山上揀墜機的碎片，我們把美國飛機上應該是作擋風玻璃用的塑膠片磨平、刻了自己的名字掛在身上，幾乎人手一件。

基中的同學重松義信甚至在仙洞附近的山上揀到了美軍的手槍，因為新奇就帶回家，但有看到的臺灣人向警察通報說：「有個日本人學生把美軍掉的槍帶走了」，警察到處找人。重松怕惹事，最後把槍丟進運河不了了之。戰後我曾經在信上向重松的姊姊提到這件事，她說她知道，顯然她也幫著弟弟瞞過了當警察的父親。

父親去世

1944年10月12日因為是基隆第一次遭受空襲，印象非常深刻。我認識的七堵車站站長野口先生是在這次空襲裡喪生的。⁷

美軍開始到臺灣來空襲後，車站裡的臺籍站員紛紛都不來上

7 《總督府職員錄》未見沿線車站中有此姓氏的職員，但據廣繁喜代彥口述，野口站長為基中同學野口輝雄之父，人名與地名應非錯記。1992年，基隆中學校第十六屆學生為紀念入學五十周年自費刊印的文集《久遠の調べ》中，野口輝雄也曾撰文提及幼年隨著父親住在平溪線上的菁桐坑、猴硐的鐵道官舍，以及10月12日空襲後，父親在七堵車站殉職一事。《久遠の調べ》（基隆中學校第十六回生同窓會事務所發行、1992年3月）74-75頁。

班了，因為知道鐵路是交通要道，一定是美軍轟炸的目標，不如在家避難。日本人還是天天值勤，但是勤務變得很勞累，必需一個人負擔好幾個人的工作。我的父親已經過勞了，自己卻毫無知覺。直到有一天，一位與我家熟識的軍醫從南部要到基隆港搭船回本土，經過八堵車站時來拜訪我們，他看到父親臉色蠟黃，提醒母親注意父親可能有肝病的問題。那天，母親吩咐我去松山買蚵仔（lâ-á，蜆）回家。我有一位姨母住在松山，每回到松山總是會到姨母家去坐坐。那天我到松山買了蚵仔以後，又到姨母家吃晚飯，並且住了一晚。第二天回到家，才知道父親已經走了。

在我有記憶以來，我的父親一直是鐵道員，正式的職稱是「構內助役」。他是 1944 年 10 月去世，在臺灣鐵道部的工作年數算來只有 15 年半左右，所以沒有「恩給」。政府公務員和一般公司員工工作滿 16 年可以領「恩給」（公務員）和「年金」（公司行號），警察是滿 13 年就算；「恩給」是可以月領。⁸ 我的父親因為年資不到，過世之後得不到經濟上的援助，全靠母親和祖母開食堂撐起一家的生活。

8 1923 年，日本制訂「恩給法」整合過往陸海軍（1875 年起實施恩給制度）及文官（1884 年起實施恩給制）的恩給制度。該法於 1959 年「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法」施行前，是國家對因公死亡、傷病，或從事公職有相當年數後退休者，因其公務上的奉獻而支給本人或其遺族年金的法律依據。戰後在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下曾一度排除日本軍人及軍屬領取恩給（勅令第 68 號），1953 年才重新將軍人軍屬納入恩給的對象（法律第 155 號）。參日本總務省網頁「恩給制度的概要」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onkyu_toukatsu/onkyu.htm，2019 年 9 月 28 日瀏覽。

在臺日人的召集令狀

在臺灣的日本人，即便是像我這樣臺灣出生、臺灣長大的「灣生」，多數人的本籍地依然是日本本土的原生地。因此 1945 年 8 月 29 日當我「召集解除」、從一三八六六部隊退伍時的本籍地仍是父親山口縣熊毛郡的老家。戰事吃緊之前，在臺日人的召集令狀（在本土俗稱「赤紙」）是從本籍地寄來臺灣，收到召集令的人也大多是回到本籍地的部隊去報到。

我知道一位大我九歲的林朔雄，父親是臺北一中畢業，他也是灣生。林朔雄從基隆中學畢業後就讀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北商畢業後到專賣局的松山工場工作。中學畢業大約 18 歲，讀北商兩年，畢業時差不多 20 歲，因為年紀到了，搭船回本籍地的福島去作徵兵檢查，檢查後發現有結核，於是又回臺灣。戰事吃緊時，林朔雄收到召集令狀，這次是到臺北連隊報到，然後被分派到馬公。專賣局在他去臺北連隊報到前為他辦了一次送別會，被分派到馬公之前又再送別了一次，沒想到在馬公因為結核又被送回臺灣。

比我大四歲的基中學長瀧巍（基中第 12 屆），19 歲時作徵兵檢查，是在臺北連隊接受的檢查，也是因為結核體檢未過，所以沒被徵召。

依往例，我應該是 19、20 歲才需要作體檢、服兵役，沒想到我中學還沒畢業就成了少年兵。



1944年10月22日，鶴田利治（基中第16屆）志願報考海軍甲種飛行兵（預科練第16期）。入伍前，15位基中同學於鶴田家為他舉辦「壯行會」送行



鶴田利治入伍前基中師友為其製作的祈願旗

從勤勞奉仕到少年兵

從我基中二年級（1943年）時起，幾乎已經沒有暑假可言。暑假前，老師要大家隔天到什麼地方集合，我們就到那裡去，通常是軍事的勞動（原文「勤勞奉仕」）。二年級的暑假，我和其他基中二年級的學生到旭丘⁹上構築大炮的障地、三年級的暑假是到基隆港搬貨——在港邊把船上的貨物卸下，搬到貨物線的火車貨物車廂。從船上搬下來的都是軍用物資，例如大炮的炮彈。炮彈裝在長方形的木箱裡，箱子的短邊有繩子，我們中學生兩個人一組，一人各拉一邊繩子搬到貨物車廂去。這麼重的箱子中學生搬不動，根本是用拖的，又因為木箱沒蓋子，都知道搬的是什麼。

在基隆港邊勞動的時候，我看到岸邊的倉庫裝滿了米和砂糖，袋子高高的堆到了天井。最底下的袋子大概壓破了，撒出來的糖在地上都溶成了糖漿。¹⁰

有段時間我因為瘧疾發病，在家休養，聽說那段時間同學們

9 「旭ヶ丘」位於大沙灣邊，可眺望基隆港內外景緻，有清朝的砲臺遺跡，又稱「平和公園砲臺山」，1927年曾被票選為臺灣八景之冠。《基隆史》（基隆市教育會出版，1934年7月）16-17頁。今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正榮院區所在地。

10 日本海軍自1944年9月到翌年3月間，曾利用軍方艦艇及徵用民間機帆船將臺灣的砂糖與酒精載運到日本本土。1938年7月，日本海軍為因應將來可能面臨的能源短缺而採取一系列石油儲備措施，其中一環即為在汽車和飛機燃料中混合乙醇。臺灣的砂糖因為是製造酒精的原料，此時正源源不斷地運送到本土以滿足戰爭的能源需求。正岡勝直〈灣糖還送作戰記錄〉《太平洋學會會誌》第21卷3-4號，1998年10月。76-78頁。

被派到船塢去勞動。基隆港西岸從港內到外海共有十八個堤岸，船塢在離第十八號堤岸更遠的靠外海處，是修船公司的船塢。那時因為淺間丸受炮擊進水，基隆港務局的人搭船出海到船邊抽水，再把船拉到船塢修補破洞。基中學生的任務是幫船塢的人遞工具、搬東西。¹¹

現在想起來，不僅暑假，只要有運兵的船來到基隆，他們都會暫時駐紮在學校。每逢這些時候，學生就不到學校，借其他的場地上課（記憶中曾有一度暫借基隆夜學校的教室使用）；學期間雖然不時也會被派到校外去勞動，勞動結束了還是會回學校去上課。這些勞務學校老師們並不參與，只傳達命令要學生何時各自到何處去集合。但自 1945 年 3 月以後，基隆中學校的師生是全面停課了。

1945 年 3 月，無論晴雨，我與同班同學幾乎天天在日新小學校的後山從事陣地構築的勞動。大概是 3 月 10 日左右，三年級的學生在基隆中學的講堂集合，校長突然宣佈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都要開始當兵；再過幾天，大家在學校都領到了一張空白的「願書」（申請書），上頭寫著本籍地、住址、生年月日，要我們填寫好，帶回家去給家長蓋章。大家都填寫了，大家都交了，沒

11 時任基隆港務局築港部管理職的吉村善臣對此事有過詳細的描述。據吉村善臣的回憶，1943 年 2 月，淺間丸在臺灣附近海域遭魚雷襲擊，因而航行到基隆港緊急避難。淺間丸來到基隆港外時船首吃水有十四米深，已經是半沈的狀態，基隆港務局動員潛水夫以築港工事特有的黏土止水工法日以繼夜作應急處理，搶修了四十日才將淺間丸拉進港內船塢。吉村善臣〈最後の築港所長として〉《双葉：基隆市双葉小學校創立 90 周年記念誌》（基隆市双葉小學校同窓会「双葉会」，1989 年 3 月）138-140 頁。

有人不願意的，因為不寫好交出去的話，恐怕憲兵會到家裡來問你爲什麼不交申請書，所以很多人自己就簽了。我因爲父親不在了，「父母同意捺印欄」的地方是自己拿父親的印章蓋好交出去的。

3月20日，大家帶著願書到學校集合。從這天起，即將從三年級升四年級的基中第16屆學生全進了部隊，住在學校。病弱或負傷的學生大約十天後退伍，其他學生連同老師則駐紮在學校，直到戰爭結束。這年4月入學的基隆中學一年級新生，則是在空襲警報下舉行了入學典禮，典禮結束後隨即被師長解散「回家待命」，再回到學校已經是戰爭結束的9月。

灣一三八六六部隊

3月20日，基隆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因爲「警備召集」，成了陸軍二等兵。與我們一起被徵召的，還有四年級的學生，他們這年破例提早結束學業，4月以後已經算是畢業生。¹² 五年級的畢業生中，未升學的學生都接受了徵召，與我們一起駐校。留校受訓的畢業生大約二十多位（臺灣人十九位、日本人七、八位），

12 1941年10月，文部省頒布〈昭和十六年度各大學部在學年限或修業年限臨時縮短之件〉，學生提前三個月畢業。長濱功《史料 國家と教育：近現代日本教育政策史》（東京都：明石書店，1994年）901頁。1942年，臺灣總督府府令第235號規定自翌年起，大學學部、高等學校高等科、專門學校等修業年限縮短六個月。《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478027。然而中學校修業年限縮短一事，筆者在文獻中未見有相關規定。

他們在校內受訓一個月後，便以「下士官候補生」的身份分發到各地的部隊去。

5月、6月左右，升上三年級的基中第17屆學生當中，大約有50個人也進了部隊，和我們一起住在學校裡。他們是被選出來當兵的，選拔的標準不清楚，大概是挑體格好的。這50個人分成兩個班，一隊留在基中，一隊成爲通信隊，到旭丘上的松本記念館去接受通信訓練。

在學校的我們都領到了一套軍服和裝備，包括帽子（類似棒球帽）、護膝、卡其色的防暑上衣和褲子（比一般軍服薄），還有橡膠底、布面的「地下足袋」，以及「小銃」（即三八式步兵銃，又稱三八小銃）。名稱雖然是「小銃」，對中學生來說是很長的大槍。也許是看起來太可憐，後來換成了騎兵銃，比較短。

學校裡有重機槍兩架，九六式輕機槍六架。重機槍一架需要五到六人運作，因爲彈藥重，光是搬運彈藥就需要四個人一起抬。輕機槍一架需要二到三人運作，一人發射，其他人搬彈藥。我們在學校游泳池附近的山腳底下挖了彈藥庫，子彈全收在這裡。

學校的兩架重機槍，有一架搬到了劉銘傳隧道¹³附近山上、警備燃料儲存槽邊的小屋裡。我們要輪班到這個小屋來作守衛。在這裡輪值最是開心，因爲不用出操，還能自己煮東西吃。

學校將四間教室改裝成了宿舍，我們吃住坐臥在學校裡，過

13 劉銘傳隧道位在獅球嶺下，是清代鐵路僅存的隧道遺構。日治以後，日本技師爲改善急速升降坡的缺點，將基隆至水返腳間（今汐止）的鐵路改道，成爲今日的竹子寮隧道線，劉銘傳隧道遂荒廢。張崑振《市定古蹟劉銘傳隧道》（基隆市文化局，2010年）3頁。

起了二等兵的生活。學校變成軍隊，老師和學生也同樣成了二等兵。大約 200 人的基中師生有正式的編隊，稱為「特設警備第 519 中隊」，又叫「灣 13866 部隊」，駐地就是基隆中學。

學校本來有一位軍事教官，是陸軍少尉川井田瑠夫，¹⁴ 這一年又有三名現役軍人來到基中成為我們的教官，一位是嘉義農林學校畢業的宮腰謙一，一位是石塚芳次郎，他是慶應大學的學生，尚未畢業就志願從軍，進飛行兵學校作特別操縱士官候補生，一位是佐藤喜久雄，也是臺南師範學校還未畢業便從軍成了現役軍人。¹⁵

戰後，我為了整理基中第 16 屆學生的名冊，到厚生省五樓的保管室去借閱了灣 13866 部隊的資料。當時，管理資料的人說「姓名都可以抄錄，但官職和階級不行」，我於是抄寫了一份名冊回來，原本打算放進第 16 屆校友的記念文集《久遠の調べ：基隆中學校第十六回生入學五十周年記念誌》，但因為沒來得及送進印刷廠，最後刊登在第 17 屆校友的記念文集《堵南の陵：戰後五〇周年記念文集》¹⁶ 裡，並且插入了一些特地回基隆和母

14 根據 1925 年的「陸軍現役將校學校配屬令」，各師範學校、中學校、實業學校、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等需有陸軍現役將校配屬，擔負訓練男子學生之務。川井田瑠夫於 1944 年成為基隆中學的配屬將校。

15 師範生原來享有緩徵與縮短役期的權利，但隨著戰事吃緊，南師的高年級學生被徵召以學徒的身份「出陣」，逕赴中國與南洋戰場；不到兵役年齡的低年級學生則為了防犯盟軍可能登陸臺灣而組成「學徒隊」，擔負警備與防衛的任務。鄭政誠〈戰時體制下臺南師範學校學生的軍事訓練與動員（1937-1945）〉《國史館館刊》41 期，2014 年 9 月。

16 《久遠の調べ：基隆中學校第十六回生入學五十周年記念誌》（基隆中學校第十六回生同窓會事務所，1992 年 3 月）。臺北州立基隆中學校第

校拍回來的照片。這份資料的正式名稱叫作「特設警備第五一九中隊・灣第一三三八六部隊 留守名簿」(GHQ 編號 9749)依照我從厚生省抄回來的名冊，灣 13866 部隊共有第 16 屆學生 127 名、第 17 屆學生 93 名，基中教師 8 名，部隊長為川井田瑠夫(中尉)。不過，1990 年我再度到厚生省去，想調查第 17 屆學生的確切人數和軍事召集日期時，相關資料已經禁止閱覽。戰爭結束已經將近五十年，有什麼好保密的呢？

3 月 20 日這一天起，直到 8 月 29 日解除徵召為止，灣 13866 部隊維持了五個月，這五個月內有一名戰歿者，是罹患瘧疾去世的。¹⁷

解除徵召時，我已經升為一等兵了。

對「少年兵」的質疑

世界上有不可以讓小孩從軍的規定¹⁸，但我十五、十六歲就已經當兵。後來聽說美軍跳島從菲律賓直攻沖繩之後，日本軍方也知道美軍的下一步應該是九州或關東，所以有臺灣兵被送到九州，在臺灣的飛機也被送到本土。

十七回生編《堵南の陵：戰後五〇周年記念文集》(一七回戰後五十周年記念文集編集委員會，1995 年 10 月)。

17 戰歿者為宜蘭礁溪出身的第十四屆學生田沢松二(本名藍家壁)，其兄藍松生是基隆中學第九屆畢業生。依據廣繁喜代彥手寫註記的基隆中學校堵陵會〈同窓會名簿〉1996 年 11 月。

18 1977 年日內瓦公約的第一和第二附加議定書分別針對國際和非國際武力衝突的人道問題，禁止徵召年齡未滿十五歲的兒童從事對敵工作。

我想知道，假如是這樣，爲什麼不讓臺灣的少年兵回家？

1980年代，我到市ヶ谷の偕行社（註：前大日本帝國陸軍的將校、軍屬高等官以及士官學校校友的社團）去詢問這個問題，他們介紹了前臺灣軍的安藤正參謀給我。安藤正曾經是臺灣軍司令部的參謀，當時已經編寫了《台灣軍》這本書¹⁹。安藤正說，如果你早幾年來，橘高少尉參謀或許知道。²⁰橘高的軍階比安藤高，少年兵是橘高等參謀們在會議中決定的。我向安藤正借了《台灣軍》這本書，在同學之間傳閱，但傳閱的速度太慢，想讀的人們都已經是日子不多的老人了，於是我在安藤先生的允許下複印了一批，一冊酌收一千日圓分發給大家。1997年時，又在三田裕次的介紹下帶著複印的書到臺北找南天書局的魏德文先生，請他幫忙重印《台灣軍》這本書，讓臺灣有興趣的人士也能一讀。²¹

19 安藤正，1911年生，1935年陸軍士官學校第47期畢業，1944年7月起任臺灣軍參謀。安藤正編《あゝ台湾軍》（台灣會代表安藤正發行，1983年5月）。1997年（臺北）南天書局依據廣繁喜代彥的重印本重新發行（臺北市：南天書局，1997年6月）。由於重印本係以安藤正個人的藏書爲翻印原本，書中的筆跡皆爲安藤正追加的註記或修訂。

20 橘高鶴雄，1913年生，1940年12月起任臺灣軍司令部參謀。

21 三田裕次（1949-2014）出身廣島，自美國留學返日後任職丸紅株式會社，因在飛機上偶遇一位日文流利的臺灣人而感到好奇，於1981年請調至丸紅臺灣分公司。在臺期間穿梭舊書攤、古書店及圖書出版社，蒐集購得的珍貴文物史料多由南天書局印製出版，無償分贈學界和文史工作者，亦合資購書贈與玉山神學院圖書館、吳三連基金會。返日後於自宅佈置藏書室，無償爲臺灣留學生舉辦「臺灣史補習班」，2008年返回廣島老家，將身後圖書捐贈廣島大學、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研究典藏單位，2014年因肝功能衰竭辭世。魏德文〈憶好友——熱愛臺灣史的三田裕次〉（《臺灣風物》65卷4期，2015年12

與三田裕次的相識也是難得的緣份。1996 年左右，三田裕次到我在大手町開的咖啡廳來找我。他曾經在在丸紅的臺北支店工作多年，回日本後也不斷地收集臺灣相關的書籍文物，並在家中為臺灣留學生開「私塾」讀臺灣史，非常盡心盡力。三田先生大概是從什麼人那裡聽說我在為灣生的同鄉會辦刊物、印書，便到咖啡廳來找我。他常常一下班，五點就到咖啡廳來，和我說話說到八點才走；快退休的時候比較清閒，有時中午過後就跑來了。我們對臺灣都有很深的感情，很談得來。我聽他說退休後想回故鄉廣島，原來他的家族在廣島有個世居的大宅邸，這位長男沒有繼承家業，反而到丸紅去找工作。後來聽說他一個人回廣島去整理舊房子，再後來，就聽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二戰結束後

1945 年 8 月 29 日，灣 13866 部隊在操場上集合，宣佈解除徵召、退伍。宣佈完畢，隊伍中的一等兵井上茂治隨即上台，以基隆中學教頭²²的身份宣佈一個禮拜後基中重新開學。

基隆中學在 9 月中復學，復學後，有些戰時疎開到鄉間的學

月) 135-142 頁。薛化元〈三田文庫與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風物》65 卷 4 期, 2015 年 12 月) 161-177 頁。鍾淑敏〈三田裕次與三田文庫〉(《臺灣史料研究》第 9 期, 1997 年 5 月) 174-175 頁。

22 依據日本的〈學校教育法〉，國、公、私立的中小學，原則上均應設置教頭的職位，以輔助校長執行校務工作，亦擁有職務的代理權，因此日本各級學校組織大致是校長—教頭—主任—教職員的關係。參國立編譯館主編《教育大辭書(六)》(國家教育研究院, 2000 年 12 月) 902 頁。

生因為基隆的家在空襲中毀壞，變得無家可歸，也就留在疎開地的鄉間不再復學，回到學校的學生因此少了許多。

10月下旬，中華民國的軍隊進駐基中校園，師生改借瀧川國民學校（今·基隆市南榮國小）的教室上課。也許是基中的學生變少了，學校便同意外校的學生進來就讀，於是原來從基隆到臺北去上學的學生也就近到基中來上課，大概有二十人，大多來自臺北商業（今·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臺北中學（今·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還有臺北商工（俗稱「siong-kang」，今·大安高工）這些考不上基中的人才去讀的學校。在瀧川借教室上課後，臺籍學生變多了，²³有些民族主義高昂的臺灣學生會找日本人的麻煩。9月復學後不久，我與一位家住臺北的松本同學結伴回家時，在八堵車站前的縱貫道被一個臺灣籍的學弟叫住，旋即從暗處跑出好幾個鱸鰻（lô-môa，流氓）將松本同學打了一頓。我將他帶到我家，稍晚確認安全了，才一路送他回臺北。這件事我令我又氣又惱，但也因此了解到這世界「變天了」。9月復學以來，日籍學生在通學路上受到莫名攻擊的事件已經時有所聞，到了瀧川國民學校以後，日籍學生的處境更加危險，田中校長就要

23 私校及實業學校一類「考不上基中的人才去讀的學校」中臺籍學生較多的現象，或許可從教育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及臺人政經地位上的弱勢來理解。對於臺灣人的子弟難以進入中等學校的原因，汪知亭認為口試在中等學校的入學考試中佔相當份量，臺灣人在日語的表現上自然不如日籍學生；此外，中等學校的入學考試有臺籍學生錄取率不超過20%的不成文規定，如此皆造成臺籍學生進入中等學校的障礙。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92頁。許佩賢亦指出由回憶錄和訪談紀錄可見，許多臺灣人若非因為家貧放棄升學，或因為考不上中學校，只能退而求其次就讀實業學校。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衛城出版，2015年）79頁。

日本學生回家去，不必到校。²⁴ 因為臺北相對安定，有些用功唸書的基中學生就到臺北的學校去繼續學業，但我一直到遣返前都未再回學校去。

1945年9月，住暖暖的基中同學王春長邀我到暖暖參加慶典，我的母親覺得暖暖不安全，不讓我去；後來是王春長親自來接我一起出發，才成行。²⁵

暖暖有煤礦，有礦坑的地方就有流氓組織，暖暖如此，金瓜石如此，九州亦然，所以我的母親對那些地方有「不安全」的印象。當然二戰之後日本戰敗的結果也讓在臺灣的日本人處境變得困難。基中第17屆學生當中，有一個和我同樣是八堵車站站員的子弟，叫櫻井章弘，我們從小就常到暖暖川的水源地下方捉魚。八堵車站邊上雖然就是基隆河，但基隆河的水濁，暖暖川比較乾淨，我們捉魚都到暖暖川的水源地。二戰結束後，我和櫻井雖然也會到水源地捉魚，但不敢待太久，就怕出事。1967年是

24 田中專一，1944年4月1日就任基隆中學校長，1946年5月31日退任。據基中教師野沢忠男的記述，田中專一自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廣島文理科大學史學科畢業後，1937年來臺。就任基中校長前曾擔任臺中一中教諭、高雄州視學官。野沢忠男〈歷代校長の横顔〉《長風萬里：台北州立基隆中學校創立55周年記念誌》（基隆中學校同窓會・堵陵會本部，1982年9月19日）25頁。

25 王春長，基隆中學第16屆學生，戒嚴時期因涉嫌加入共黨組織，以判亂罪被處有期徒刑十年。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紀經俊等叛亂案〉，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27912123/32/070，1950年9月16日。另外，據筆者2019年7月30日對基中第16屆學生莊錦也（本名莊錦璋）的訪談，1947年基隆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後，莊錦也與王春長、吳金塗曾作為基隆中學的學生代表參加過一次處理委員會的會議；1948年，基隆市舉辦演講比賽，題目是「勘亂救中國」，莊錦也代表基中參賽，講稿是王春長擬的，結果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基隆女中的代表。

遣返後我第一次回臺灣，特地到水源地去看看小時候戲水捉魚的地方，卻發現乾淨的暖暖川變黑了，當地的老人說日本時代不准在水源地洗煤的，戰後不管，所以變髒了。後來我又回臺灣好幾趟，卻再未回到水源地去看一眼，不忍心。

基中第 13 屆學生當中，有一位家住在義重町的學長，叫佐佐木務。聽說他在日新小學校唸書的時候就會欺負學弟，到了基中故態依然；他欺負人是一視同仁，不管臺灣人、日本人都吃過他的虧，所以戰後會怕——怕臺灣人來尋仇。戰後，他到蘇澳去上漁船工作，出門一趟就是一個月，回來的時候就帶兩條大魚，一條送給我，一條帶回家。因為我家在八堵，他從宜蘭線搭車到八堵車站後先待在我家，讓我到義重町去佐佐木家送消息，等到晚上人跡少時，他兄長再到我家來接他回去。

中華民國政府軍在基隆上岸是在 10 月 17 日，在這之前，駐守在基隆中學校的臺灣軍律部隊在 10 月初就先撤離了。日本的軍人離開八堵後，住在八堵的日本人更加惶惶不安。中華民國的軍隊進駐基中的前兩天，突然公告命令「駐屯學校半徑一千米以內的日本人全數離開；軍隊進駐當天，行進道路百米以內日本人禁止進入」，祖母、母親和我們都發愁了，但也不敢抱怨，急忙搬到松山去。大概過了十天，全家回到八堵的家，這時家中已經有兩個房間被中國軍隊接收，住著一對中國人的中尉夫婦。中尉每天早上會到駐屯在基中的部隊值勤，家裡的妻子整日在家不作飯也不打掃，自有一名小兵每日把飯送來。

這名小兵看到我們打開水龍頭的水就喝，好像非常訝異。漸漸地我們熟了，也會和他筆談，但除了知道他來自上海以外，似乎不認得太多字，也不會算數。自從有中國軍官住在我家後，住

家附近就看不到一些鬼鬼崇崇的中國兵了。進出我家的中國兵雖然看起來是個好人，但畢竟語言不通，家附近又沒有懂中文的人可以幫忙翻譯，對於我們這樣只有母親和老人、小孩的家庭來說，還是有深深的不安。再加上那段時間每到了深夜，常常會聽見縱貫道上傳來小孩的哭聲，一連數日，都是往基隆的方向去，有時一個晚上會聽見三回。基隆港的港灣裡停滿了大陸來的戎克船，那陣子不管是日本人還是臺灣人，都有小孩不見的消息，人們議論著如果小孩被藏在那些船裡，大概一出海就不可能再找回來。我們家沒有了父親，我的兩位兄長又從軍未歸，每天傍晚總要看見六個弟妹回到家才能放下心來。²⁶

遣返

1946年4月8日，我們一家到雙葉國民學校去集合，10日搭船離開臺灣。船離開臺灣的時候，許多人哭了，許多人用力地揮手。岸邊的中國兵有的也朝我們揮手，有的把手放在胸口上作出噁心想吐的樣子。

前幾年日本上映了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2008年於臺灣首映，2009年於日本上映），我到電影院去看了。日本人被遣返的那一幕，故事裡的日本老師衣著整齊地穿著大衣、提著皮箱

26 廣繁喜代彥在自費刊印的自傳中，曾詳述戰後這段日子的經歷。廣繁喜代彥《昭平成を生きて：湾生の苦勞長寿八十年》（2009年）29-33頁。戰後直到遣返回日以前，孩童失蹤的事件在日人社群間時有所聞，然無從查明。

站在船上——事實上不是那樣的。遣返的時候，因為美軍規定只能帶一件行李，每個人都是背著大布袋，把能帶走的都帶上了。那時還謠傳美軍不准帶照片，所以戰後才回到日本的灣生幾乎都沒有畢業紀念冊和照片留存，一方面能帶的東西不多，能捨棄的就都捨棄了。我後來在灣生的同學會、同鄉會裡當幹事的時候，向戰敗前就回日本讀書或工作的學長收集他們的照片和畢業紀念冊，有些就自費複印出來給大家傳閱，因為相當珍貴。

我的朋友賴炎輝，他是基隆壽公學校、基隆中學畢業。²⁷ 基中畢業後，一度應壽公學校的寺內校長的邀請回到公學校擔任助教，戰後當了警察，但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就已經辭職。賴炎輝擔任警察期間，曾經協助日本人的遣返工作。他在執勤時，對即將遣返的日本人說：「大家請好好保重」。日本人以為他是中國兵，沒想到他會說日文並且關照他們，都很意外。遣返的日本人當中有賴炎輝的小學老師，賴炎輝就拜託同船的日本人多照顧老師。

日本人遣返時，如果是美國的士兵在值勤，美軍會走來走去簡單看一看行李就放行；如果是中國兵，會把他們的行李翻個底朝天，並直接取走值錢的東西。我有一個父親留下來的鐵道員的手錶，就這樣被中國兵拿走。賴炎輝說，中國兵通常拿了東西，晚上就賣了換錢。

27 賴炎輝是基隆中學第13屆學生，妻子出身基隆的許梓桑家族，其子留美回臺後，在臺大醫院擔任肝臟科醫生。參《堵南會報》第十號（堵南會本部，2007年11月）。賴炎輝也曾經撰文記述戰後擔任警察的經歷，參賴炎輝〈終戰直後の台湾〉《堵陵會報》第56號（堵陵會本部，1997年5月）。

遲來的畢業典禮

遣返回日本後，我和祖母、母親和弟妹們暫住在祖父山口縣的老家。1945年因為中學生的畢業年限縮短一年，在我離開臺灣前的1946年3月就應該算是中學畢業了，可是當時因為遣返前的忙亂，再加上學校有中國軍隊進駐，學校沒有任何通知，我們也沒想到去學校辦理畢業的事宜。²⁸回到日本找工作時，就因為沒有中學畢業的證明，吃了不少虧。我因此想辦法聯絡上基隆中學校的田中校長，希望校長能補發畢業證書給我，沒想到校長的回覆竟然是「要付錢」。

離開臺灣時，依規定最多只能帶一千塊錢，這一千圓的臺灣銀行券在下船的港口換成日本銀行發行的一百圓鈔票十張，就是我們所有的財產了。我們的船在大竹靠港，下船後，我向當地人買了四顆八朔蜜柑，花了二十圓，當下知道了未來日子的艱苦。因此為了畢業證書要付錢的話，我想也不想就放棄了。²⁹

後來在同學間問起，知道許多同學都遇到了和我一樣的問題

28 日後，廣繁喜代彥在日本的灣生同鄉或校友團體中得知，即便在遣返前的紛亂中，許多中學校依然在三月為畢業生舉行了畢業典禮，例如高雄中學和臺北第三中學。臺北第三中學的畢業典禮上，大欣鉄馬校長甚至勉勵畢業生要找機會補修中學的課業，因為戰時動員耽誤了正常的教務，畢業生恐怕學力不足。廣繁喜代彥〈テレビ卒業式異文〉《堵陵會報》第73號（堵陵會本部，2005年10月）14頁。

29 1946年時一千日圓的價值或許可以從當時的事件作為參照。1947年年初發生日本各地勞工要串連罷工，要求提高工資的事件，後來雖在2月1日實施日前被盟軍壓制，但從勞團提出的要求可知當時日本的平均薪資約556圓。《日本勞働年鑑》第22集，第一出版，1949年8月。

題。小野代輝花了錢，買了畢業證書，但爲此縮衣節食了三個月；小円山茂的家裡收到了校長寫來的信，單刀直入地問要不要買畢業證書，他不想增加家中的負擔，仍舊到礦坑挖煤掙錢，再也不去想文憑這件事。鶴田利治爲了考大學，曾經到外務省去索取基中的畢業證書，外務省的官員告訴他：別的學校都把學生名冊交來了，爲什麼唯獨基中沒有交學生名冊呢？

其他學校的老師，寧願犧牲自己的可攜行李數量，把學生名冊帶回日本，成了將來政府發給就學證明的依據。基中的第 16 屆畢業生，只因爲沒有名冊，成了無法畢業的畢業生。

多年後，在一場基中同學的聚餐裡，有人提議何不自己來辦一場畢業典禮。當時在教育電視台有一個下午一點鐘的節目叫作「十三時秀」，主持人是剛從紐約留學歸國的黑柳徹子和汽車評論人三本和彥。由於我的妻子是攝影師，與三本和彥一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便向他探詢這件事，電視台最後決定在 1973 年 3 月 13 日的「十三時秀」節目上爲基隆中學校第 16 屆的學生舉行畢業典禮。爲了舉辦這場典禮，除了「緊急徵召」四散在各地的同學，我也聯繫了田中校長，沒想到校長覺得多此一舉，拒絕出席。我向基中老師野沢忠男商談這件事，認爲校長不出席也罷，有學校老師代表就行，但野沢老師堅持畢業典禮必須有校長列席，並且幫我們與校長交涉，最後終於把校長請來了。我們甚至自費制作了畢業證書，校長卻說，若要他蓋校印，必需在證書上明記「昭和 21 年（1946 年）3 月 1 日畢業，因諸多緣故未能及時頒發證書，乃於昭和 48 年（1973 年）3 月 13 日頒授」，同學們只好把這段文字印成貼紙，在野沢老師鎌倉的家中完成了畢業證

書。³⁰

電視台錄影的當天，節目製作人準備了三套卡其軍服，希望找幾個人穿上，好重現當年的樣子。可是大家因為要上節目，都穿得很體面，誰也不願意去換穿那三套舊軍服，最後還是心腸最軟的三個同學勉強答應了。

在電視台的牽成底下，基隆中學第 16 屆學生終於完成了遲來 27 年的畢業典禮。

校友會與基隆會

基隆出身的灣生在日本有許多聯誼的團體，有些同班的學生有學級會，也有不分學年、以學校為名的校友會，經常聯絡感情。我的兩所母校——雙葉小學校和基隆中學校都有校友會，另外，基隆出身的灣生還有「基隆會」。

基隆中學校的校友在遣返回日本後不久便有了同窓會，³¹ 因為

30 廣繁喜代彥曾於相關人逝世後，在會報上撰寫過一篇長文詳述這場畢業典禮的曲折。廣繁喜代彥〈テレビ卒業式異文〉《堵陵會報》第 73 號（堵陵會本部，2005 年 10 月）14-17 頁。

31 據基隆中學校史地老師野沢忠男的回憶，在臺日人遣返回日後翌年（1947 年），第五屆的基中學生去找他，向他詢問同學們的聯絡方式好發送同學會的通知。戰後第一次校友會因為遇到全國郵務電信大罷工，許多通知信寄不出去，但仍有十多位學生以及二位基中教師參加了這場戰後第一次的同學會。野沢忠男〈回顧二十年〉《堵陵會報》（創刊號，1965 年 6 月）2 頁。堵陵會歷屆校友會的地點和活動，可參考第五屆校友永井康雄的回顧，永井康雄〈堵陵會 35 年の歩み〉《長風萬里：台北州立基隆中學校創立 55 周年記念誌》（基隆中學校同窓會・堵陵會本



1949年基中第三次同窗會，攝於明治神宮外苑
前方右二為戰前基中教師野沢忠男，前方中央為音樂教師青木久

有從前基中的史地老師野沢忠男和音樂老師青木久幫忙聯繫，人數越加越多，已經不只是同班同學的同窗會，遣返前曾經在基隆中學校就學的人們都來參加了。我是在大約 1952 年，第六次校友會時開始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65 年 3 月，我們正式成立了基中校友會「堵陵會」，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母校座落在八堵的丘陵地上，1972 年，校友會創會 45 周年的時候，我從創會元老的永井康雄（基中第 5 屆）手上接下常任幹事的職務，一直到堵陵會結束。³²

部，1982 年 9 月 19 日）222 頁。

32 堵陵會因成員凋零，於 2009 年宣告解散。自堵陵會成立以來發行的《堵陵會報》（一年二期）亦宣告停刊，計發行 79 期。堵陵會在廣繁喜代彥擔任幹事期間，即以自身經營的咖啡廳「ひろ」（東京都千代田區大手町 1-6-1）為堵陵會事務局의 聯絡處，長期協助會務營運及會報刊行。據廣繁喜代彥口述，《堵陵會報》停刊後仍發行了第 80 期的會務決算報告，此後「事務局」仍作為戰前基中校友會的聯絡窗口，大約五年後才完全結

再說到双葉小學校（今·基隆市仁愛國小）的「双葉會」。1964年，從前在双葉小學校任教的高橋（礼一）老師以及住在廣島的畢業校友們先是在廣島組成了「學級會」，這是以昭和14年（1939年）畢業的同學年校友為主的同窗會，接著每年都有聚會。1967年時，今田稔（1939年畢業）與我（1942年畢業）一起籌劃了「双葉會」，目的是希望不分學級的双葉小學校校友有一個共同的園地，並且在當年8月5日舉行了第一次的双葉會校友會。1967年到1983年間，双葉會沒有會長，擔任幹事的一直都是今田稔和我。双葉會最後一次製作的會員名冊是在1983年，此後我便未再經手双葉會的會務，只知道最後一次活動是1992年在浦安市的聚會，後來便無聲無息的解散了。

從臺灣遣返回日本的時候，因為有謠傳說照片不准帶上船，又因為畢業紀念冊占空間，就跟著書和字典留在臺灣，回到日本後關於臺灣的留影一張也沒有。1960年代開始有機會可以回臺灣了，我時常帶著相機回到學校和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拍照，在校友會的時候洗出來給大家看。昭和快結束的時候（1980年代後期），我向小學同學宮西昭四郎借來了 he 留存的畢業紀念冊，複刻重製了五十冊給班上同學。³³

大約是1995年的時候，那時有一些灣生的校友會因為會員逐漸凋零，陸陸續續在解散。我與基中校友的永井康雄商議，既然其他地方的灣生都有以城市為名的團體（例如臺中會、臺南

束堵陵會的會務。

33 這冊以校長三ッ橋安郎為檢查得許者的畢業紀念冊，封面題名為《基隆市双葉国民学校 第44回修了記念写真帖》，收藏了當年四個畢業班級的珍貴合照和學校生活照。當時複刻五十冊的費用為二十萬日圓。



廣繁喜代彦（前排左四）1942年小學畢業照



1967年攝於双葉小學校



1967年義重橋風景

會)，何不成立「基隆會」讓從前住在臺灣時的鄰人親友，以及失去了校友會的人們可以有一個大家的聚會。1997年，我們便舉

辦了第一次的「基隆會」，時間選在 7 月 20 日的「海之日」。³⁴「基隆會」維持了二十多年，會務的運作一直是以我的咖啡廳「ひろ」作為大家的聯絡處，咖啡廳收掉以後，就靠著幾位幹事用自家電話聯繫。2019 年，基隆會第 23 年度的聚會之前，我接到幾位長年來始終無償在幫忙會務的老朋友和後輩的電話，他們各自因病、因歲數，都感到再也難以為繼。於是在這一年 7 月 20 日的聚會時，由幹事武石道男向大家報告，「基隆會」就此解散了。

34 「海之日」是 1941 年戰時日本為強化民眾對海防的認識，取明治天皇經由海路自青森經函館成功歸返的日子為紀念日。「海の日を迎へて」系列報導《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7 月 20 日 1 版。戰後，「海之日」一度廢止，直到 1996 年重新施行，然其意義據〈国民の祝日に関する法律〉（祝日法，1948 年 7 月 20 日法律第 178 號）已轉變為「感念海洋的恩惠，祈求海洋國家日本的繁榮」。2003 年後，國定假日「海之日」改為七月的第三個周一，但基隆會的固定聚會日期並未隨之變動。廣繁喜代彥和永井康雄選擇 7 月 20 日作聚會的日子，只因為 1997 年基隆會第一次聚會時，這一天剛好是例假日，並因故鄉基隆是海港的緣故。接受筆者訪問的幾位基隆灣生，包含廣繁喜代彥自身，對戰前的「海之日」並沒有特別印象。

基隆灣生相關資料

製表人：黃毓婷 2019 年 4 月

類型	作者	書名	出版者	出版日期 (西曆)	備註
基隆 會資 料	堵陵会	堵陵会報集 (第一編)	台北州立基隆中學校同窓会	2000 年 11 月 23 日	
	堵陵会	堵陵会報集 (第二編)	台北州立基隆中學校同窓会	2004 年 4 月 24 日	
	堵陵会	堵陵会報集 (第三編)	台北州立基隆中學校同窓会	2007 年 12 月 28 日	
	堵陵会	堵陵会報集 (第四編)	台北州立基隆中學校同窓会	2009 年 10 月 30 日	
	堵陵会記念誌編 集委員会 編集	長風萬里：台北州立基隆 中學校創立 55 周年記念 誌	基隆中學校同窓会 ・堵陵会本部	1982 年 9 月 19 日	
	堵陵会	堵陵会報：創立 45 周年 記念特集号	基隆中學校同窓会 ・堵陵会本部	1972 年 11 月 1 日	
	堵南會	堵南會報 合本共十冊		1999 年 - 2007 年	
	玉石會	玉石會報			基中第十二屆 同窓會誌
	基隆中學校第十六回生同窓会	久遠の調べ：基隆中學校 第十六回生入学五十周年 記念誌	基隆中學校第十六 回生同窓会事務所	1992 年 3 月 20 日	
	臺北州立基隆中 學校第十七回生 編集	堵南の陵～僕達の戦争体 験・半端な陸軍二等兵～ 戦後五十周年記念文集		1995 年 8 月 28 日	
	基隆中學校同窓 会編集	私の八月十五日：終戦 五十年記念文集	堵陵会	1995 年 10 月 10 日	
	双葉会	双葉百年回想の台湾：基 隆市双葉小学校創立百周 年記念誌	双葉会	1999 年 12 月 1 日	
	基隆市双葉小学 校創立九十周年 記念誌編集委員 会	双葉：基隆市双葉小学校 創立 90 周年記念誌	基隆市双葉小学校 同窓会「双葉会」	1989 年 3 月	
	野崎東	昭和を生きる教師－台湾 編一	日新小学校同窓会	1999 年 2 月	

	日新小学校同窓会	アジンコートの灯が見える：基隆市日新小学校創立六十周年記念誌	日新小学校同窓会本部	1984年12月	
廣繁喜代彦資料	廣繁喜代彦	昭和平成を生きて：湾生の苦勞長寿八十年		2009年1月	
	廣繁喜代彦	手稿 一批			
	廣繁喜代彦	翻拍寫真 一批			
	廣繁喜代彦	手繪地圖 數張			
再製資料	三ッ橋安郎	我が基隆	基隆市教育會編	1937年2月20日	
	安藤正	ああ台湾軍：その想い出と記録	渡辺瞻写堂	1983年5月20日	
	鶴田利治等	留魂録		1944年10月	
	三ッ橋安郎	基隆市双葉国民学校 第44回修了記念写真帖		1942年3月	
	三田裕次 手抄	臺灣統治終末報告書	臺灣総督府残務整理事務所	1946年4月	手抄稿影本